

宋祁對韓愈的接受—— 以重新、探源、校改為中心的討論

謝佩芬

中國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副教授

摘要

韓愈文學史地位崇高，廣受宋人重視，相關論述亦多。學界成果豐碩，但於宋祁對韓愈之接受泰半偏重《新唐書·韓愈傳》之比較研究，仍有續加探討空間。本文以重視創新、探求淵源、校改文章為中心，具體分析宋祁評說韓愈「新語」、「卓然不朽」、「古人意思未到」、「自名一家」之意涵與原由，並考辨新、舊《唐書》關於韓愈古文淵源史料，理解宋祁刪除梁肅資料用心，最後以宋祁校改韓愈作品例證，知曉改修情形、利弊得失，藉此掌握宋祁對韓愈接受之觀點與心態。

關鍵字：古文、宋祁、接受史、新唐書、韓愈

通訊作者：謝佩芬 · E-mail: pfhsieh@ntu.edu.tw

收稿日期：2010/12/20；修正日期：2011/02/16；接受日期：2011/02/21。

壹、前言

韓愈（768～824）既具有唐宋古文八大家身分，又與宋詩特色發展關係密切，他對宋代文學或思想的影響自然受到諸多重視，尤其近年關於韓愈在宋代詩文、思想各方面的重要性愈來愈受到關注，相關論著日趨豐富，¹雖然學者較以往注意歷時性問題，無論討論韓詩的「影響焦慮」或韓集版本流傳問題，都會按照時代先後臚列敘述宋代重要意見呈現情形，但無可否認地，學界論及「韓愈」在宋代的接受情形時，焦點仍常集中於歐陽脩（1007～1072），一再證明他對於宋代韓愈接受的關鍵作用。

就現存資料看來，歐陽脩對於韓愈詩文的推獎自是功不可沒，但有時獨木難撐大廈，歐陽脩之外，與他時代相近的其他文人又是如何看待韓愈？他們對於韓愈地位的奠定、鞏固有無貢獻？影響如何？似乎都是應該再細細審視的課題。以常被引用的〈記舊本韓文後〉為例，歐陽脩自述：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²

所謂「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便表明當時風尚的轉移與韓文的流行具有因果關係，如果不是時機成熟，學者漸趨於古，即使歐陽脩補綴校定韓集，韓文也不可能廣為宋人接受。

而在「漸趨於古」的當時，宋祁（998～1061）對於韓愈的觀看、書寫其實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清人趙翼（1727～1814）曾專立「《新書》好用韓柳文」篇章，說道：

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

¹學位論文與專書如：張蜀蕙。《書寫與文類——以韓愈詮釋為中心探究北宋書寫觀》（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2000）；谷曙光。《韓愈詩歌在北宋的接受歷程及其詩學意義發微》（碩士論文，安徽師範大學，2003）；高光敏。《北宋時期對韓愈接受之研究》（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2004）；陳昭吟。《宋代詩人之「影響的焦慮」研究》（博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2007）；曾金承。《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博士論文，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2008）；吳立仁。《中唐至北宋前期韓愈形象的歷史演變》（碩士論文，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09）；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張瑞麟。《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博士論文，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2010）。

²【宋】歐陽修，李逸安點校：〈記舊本韓文後〉，《歐陽修全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1），卷73，1056-1057。

遺。〈張巡傳〉則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書〉一疏，而於宗元傳載其〈遺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微賦〉一篇，可見其於韓、柳二公有癖嗜也。³

具體臚舉《新唐書》採錄韓愈、柳宗元（773~819）古文入傳的篇目，證明《新唐書》確實喜用韓、柳文。不過，趙翼談論範圍限定在「古文」，先說「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接著特別標舉宋祁以修史為根本，選擇韓柳文可入史的篇章，趙翼眼中的宋祁似乎是以史料保存價值為依準觀看、採用韓柳古文，與個人審美好惡或文學趨向關聯不大。楊家駱（1912~1991）則指出：

又書中多採韓、柳古文入傳，除〈韓愈傳〉載〈進學解〉、〈諫佛骨表〉、〈潮州謝表〉、〈祭鱷魚文〉外，〈吳元濟傳〉載〈平淮西碑文〉，〈張籍傳〉載〈答籍〉一書，〈孔戣傳〉載〈請勿聽致仕〉一疏，〈陳京傳〉載〈禘祫議〉，〈李勃傳〉載愈所與書，〈甄濟傳〉載〈答元微之書〉，〈忠義傳〉載〈張中丞傳後序〉，〈孝友傳〉載〈復仇議〉。〈柳宗元傳〉載〈與蕭俛書〉、〈許孟容書〉、〈貞符自微賦〉，〈段秀實傳〉載〈段太尉逸事狀〉，〈孝友傳〉載〈駁復仇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文有載而當者，亦有以其喜古文而列入者。⁴

增記《新唐書》採錄韓愈、柳宗元古文入傳的篇目，其中援引韓文的數量又較柳文為多，似乎顯示：在宋祁心中，韓文價值高於柳文。對於這樣的現象，晚近陸續有學者進一步研究檢證，⁵或是以新、舊《唐書》〈韓愈傳〉為焦點，探討其間異同，或是比較韓柳古文在新、舊《唐書》的引用情形，都已觸及宋祁對於韓愈的接受狀況。

雖然如此，但關於宋祁對韓愈的接受議題仍然還有待開發的空間。宋祁自慶曆4年（1044）受命編修《新唐書》，⁶歷經17年苦心撰著，終於完成，原初趙槩（998~1083）、

³【宋】趙翼，王樹民校注：《廿二史劄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卷18，381。

⁴楊家駱。〈新唐書述要〉，載於《二十五史識語》（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344。

⁵梁承根。《兩《唐書》文人傳之比較》（博士論文，南京大學，1997）；郝至祥。《兩《唐書》書法暨筆法比較研究——兼論《新唐書》闢佛刪史》（碩士論文，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余歷雄。《兩《唐書》採摭韓愈古文之研究》（博士論文，南京大學，2004）；錢忠平。《《新唐書》文學批評研究》（碩士論文，浙江師範大學，2007）；唐鳳霞。《《新唐書》的編纂及其學術成就》（碩士論文，安徽大學，2006）；邢香菊。《《新唐書·文藝傳》研究》（碩士論文，河北師範大學，2007）；譚瓊。《兩《唐書》文學批評比較研究》（碩士論文，汕頭大學，2008）。

⁶【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79），卷155、156。

余靖（1000～1064）皆參與其事，但「刊修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⁷後來歐陽脩、梅堯臣（1002～1060）等人陸續加入，而宋祁即使外貶成都，仍隨身攜帶《新唐書》刊修，⁸從「精思十餘年」，⁹「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為日且久」，¹⁰不難看出，宋祁確實投注相當多心力，將《新唐書》當做一生重要志業般地審慎編寫。

這種情形下，宋祁好採韓柳文入傳必然有他堅持的理由。身為《新唐書》撰寫者，宋祁代表的是官方省視前朝歷史的立場，尤其歷經五代戰亂後，宋人急欲重建秩序，回復文化，宋祁在《新唐書》顯現的取捨極可能與當時朝廷態度、士人群體想法接近，藉由宋祁在《新唐書》中透露的韓愈接受，可以從另一側面明瞭北宋中期對韓愈接受的官方情形。現今的《新唐書》列傳研究有助於我們對這方面的理解，但仍有部分疑問有待解決，例如，梁肅其人其事在新舊《唐書》的呈現大有不同，中間有無深意？宋祁採寫韓柳文入傳的確實狀況為何？都是有意思的課題。

公領域的任務外，宋祁同時也是位勤於著述、極具己見的文人，¹¹在他個人閱讀詩文、創作過程中，不免也有從自我文學角度觀看前人的經驗，在眾多文人中，宋祁對於韓愈的定位是什麼？觀察書寫的角度是什麼？都還有探討價值。更重要的是，宋祁的觀看不僅僅只是他個人如何觀看過去，也可能因為他的影響力而提供時人更多參考，更可能影響後代評價，所以宋祁的接受在當時、後世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是否具備「第一讀者」¹²的性質？都應探究。

此外，宋祁與其兄宋庠（996～1066）均曾校注韓愈文章，有校本傳行於宋代，洪興祖（1090～1155）、謝克家（？～1134）、文謙（？～？）、方崧卿（1135～1194）、朱熹

⁷【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全宋筆記》（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6，第二編），卷4，55。

⁸【宋】魏泰：《東軒筆錄》，《全宋筆記》（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6，第二編），卷15，171。

⁹【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全宋筆記》（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3，第一編），卷上，47。

¹⁰〈雅量〉「歐陽公於修唐書」條，參見【清】潘永因：《宋稗類鈔》，《筆記小說大觀》（臺北市：新興出版社，1984）。

¹¹宋祁著述豐富，宋代刊刻編集的《景文集》共有200卷、150卷、100卷、78卷4本，但當時即有所散佚，參見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116-121。另可能撰有《雞跖集》20卷，詳見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輯考》（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118-128，作品極多。

¹²關於「第一讀者」，接受史研究中常會提及，姚斯認為「第一個讀者的理解將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一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就是在這過程中得以確定，它的審美價值也是在這過程中得以證實。」參見姚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25。陳文忠更明確具體地指出：「所謂接受史上的『第一讀者』，是指以其獨到的見解和精闢的闡釋，為作家作品開創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礎、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讀者；從此，這位『第一讀者』的理解和闡釋，便受到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重視，并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參見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64。不過，所謂「被充實和豐富」未必都是正面的承繼接受，只要是針對這位讀者所提出見解而衍伸的討論應當都算是「被充實和豐富」，因為他第一個發現、提出具有討論價值的觀點，重要性自然不可小覷。

(1130~1200)等韓文重要校注者都曾引用其中資料，¹³《新唐書》資料為眾家所採錄引校的也不在少數，¹⁴評論韓愈「新語」意見也被多家詩話引用，這些都是可以再細部探討的問題。

為了方便觀察宋祁接受韓愈的面向，擴大研究範圍，本文不以《新唐書》文章為主，而以分類方式研析其間涉及的課題。

貳、重視語意創新

宋祁論及韓愈的意見，除《新唐書》外，《宋景文公筆記》共留存五條紀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宋祁回顧求學為文歷程及個人體悟的一段文字，說道：

余少為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闕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為諸生冠。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為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厓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為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¹⁵

陳明年少為學習作詩賦原初僅是為了獲取養親資財，從未希求藉此立名於當世，自宰相夏竦（985~1051）、龍圖學士劉筠（971~1031）相繼另眼相待，稱譽不已後，宋祁才受到激勵而自覺性地模寫有名士文章，以求有所成就。但直到奉詔修撰《唐書》，廣閱前世著作方才體悟為文真義。接著，宋祁以論斷方式展現個人意見，認為文章必得具有自我獨特面貌，才能不朽傳誦，再從反面陳述如果只是模倣前人，因循舊規，終究淪為他人臣僕而無法自立，甚至引古人「屋下作屋」譏言，加強一己意見的說服力。順著援引古人言詞的論述方式與脈絡，宋祁更進一步標舉陸機（261~303）、韓愈謝華啟秀、陳言務去的理念做為標竿，強調是「為文之要」，顯示宋祁絕未將書寫文章視為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反而追求久

¹³ 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37-239、439-440。

¹⁴ 同上註，389。

¹⁵ 【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卷上，47。

傳後世的可能，「五經皆不同體」、「百家奮興，類不相沿」印證宋祁想法確為諸多前人奉行的真理。而在浩瀚文人中，宋祁特別標引陸機、韓愈言論，正顯示他對兩人理念的認同，陳言務去是要自名一家的必備條件。這段話雖然是以筆記方式記錄，好像不如專篇文章論證嚴謹，但宋祁縷述個人為學習文的歷程與心情，懇切真摯，別具動人力量。

所謂「陳言務去」，除了堅持陳濫文詞的汰除刪芟外，必然也會涉及文意的新創開拓，宋祁為趙湘（959～993）文集題序時，曾經藉由與近世詩人的倣擬比較凸顯趙氏貢獻，說道：

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巧奇博于少陵，蕭散于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謝一家者歟。¹⁶

宋祁闡述文學觀念時，總是習慣將目光游肆於歷史長河之中，縱覽古往今來文人表現，尋覓適合做為例證的對象，以加強論述信服度，也使人們易於理解接受。如本篇序文先是有感於近世詩人師祖前人而不知變通的現象，繼而指明詩人摹倣對象與面向，透露當時詩壇風貌，雖然杜甫（712～770）、王維（700～761）、白居易（772～846）、賈島（779～843）、薛能（？～880）等人都普受歡迎，但當千人一律時，難免充斥陳言舊辭而不具各自特色。在這種倣擬風氣盛行的氛圍裡，趙湘能夠不傍古緣今而設法探求開創新意，自然能自成一家，得到宋祁推重。

杜甫、王維、白居易幾人不只是當時詩人擇選的典範人物，也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上乘詩人，後學者的作品所以讓人未讀先厭，顯然問題不在於他們學習的對象，而在於學習的方法與結果，因為後學單從字句等表面層次認識杜、王諸人，只得其貌而未得其神，因而不具自我面目。賈島、薛能文學地位雖不及杜甫三人，但文名均曾顯揚一時，¹⁷作詩重視鍛鍊精到與避陳出新，¹⁸符合宋初希慕擺落唐人陰影，另覓蹊徑風尚。相較之下，趙湘敢於拋棄潮

¹⁶ 〈南陽集序〉，參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卷515，654。

¹⁷ 如洪邁《容齋隨筆·三筆》載：「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露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遍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參見【宋】洪邁：〈唐昭宗恤錄儒士〉，《容齋隨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678），卷7，501。

¹⁸ 賈島向以「苦吟」為人熟知，《新唐書》載：「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見【宋】歐陽修、宋祁：〈賈島傳〉，《新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2003），5268。朱熹訓勉門人時則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

流，追求「獨行」，衝越既存藩籬，探求新意，才能卓然自成一家。可見宋祁是意、詞兼重，甚至，只有新意的引導領率，才能避除陳言舊辭而有嶄新文句的產生。

稍後於宋祁的王石安（1021～1086）曾感歎：「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¹⁹生於光芒萬丈的唐代詩文高峰之後，宋人的確深刻感受「開闢真難為」的壓力，宋祁身為具有高度自覺的文人，自然不願陳陳相因，落入俗套窠臼之中，所以會一再稱許韓愈「造端置辭」「不襲蹈前人」、²⁰「刊落陳言」，²¹甚至具體引述「新語」例子，說道：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願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²²

文中例句分為二種，一為險語，一為新語，柳宗元文字出自〈對賀者〉，²³原文恐作「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慟哭」，²⁴乃是柳宗元因罪貶放永州，京師來客本想寬唁柳宗元，沒想到柳宗元看來浩浩然，通達無所哀戚，透過主客對話，柳宗元自白：

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兩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參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訓門人九〉，《朱子語類》（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卷121，2924。賈島作詩苦心精詣以至有成情形可見一斑。薛能〈自諷〉詩表白：「千題萬詠過三句，忘食貪魔作瘦人。行處便吟君莫笑，就中詩病不任春。」參見孫通海、王海燕（責編）。《全唐詩》（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卷561，6510，並曾賦寫十首〈折柳〉詩，序文云：「此曲盛傳，為詞者甚眾，文人才子，各銜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為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弗伐，知音其舍諸。」參見〈折柳十首·序〉，孫通海、王海燕（責編）。《全唐詩》，卷561，6518，批判文人賦詠楊柳之詞語常淪於陳熟，自負一己乃專於詩律之人，故不愛隨人，而力求搜難抉新，誓脫常態，觀其自作所云：「高出軍營遠映橋，賊兵曾斫火曾燒。風流性在終難改，依舊春來萬萬條。」參見〈柳枝四首〉其四，孫通海、王海燕（責編）。《全唐詩》，卷561，6519，確實有別於一般折柳送別、「條似舞腰，葉如眉翠」文句，雖然洪邁訾議薛能「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參見【宋】洪邁：〈薛能詩〉，《容齋隨筆》，卷7，95，沈括也有：「薛許昌答書生贈詩，『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能破觚為圓，剝剛成柔，始為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參見【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詩有變態」條，（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39，508，批評，但無論宋人是否欣賞、贊同薛能意見與作品，就上引資料看來，薛能確實頗具創新意識。

¹⁹ 《陳輔之詩話》，參見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臺北市：華正書局，1981），291。

²⁰ 【宋】歐陽修、宋祁：〈韓愈傳〉，《新唐書》，卷176，5265。

²¹ 同上註，5269。

²² 【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58。

²³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卷14，361-362。

²⁴ 同上註，362。

「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²⁵可知柳宗元其實心中悲傷莫名，但他不以常人裂眦慟哭的直截方式表露情緒，反而以嘻笑長歌面貌應對世人，這其實是一種「大痛無聲者也」²⁶的表現，馮時可（1541?~1621?）分析：

柳子厚「嘻笑之怒，甚於裂眦」，或云當作「嘻笑之譏」，今人謗人或嘻或笑，若有意若無意，乃其恨深而媚之甚者也。若裂眦之罵出自直發，此之謂怒，豈甚仇哉？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傾木，而無傷於人之血脈；隙穴之風，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噫嘻！今之為隙穴風者亦多矣！劉禹錫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二子皆身處妬媚之間，故其言有味如此。²⁷

舉當時謗人者用或嘻或笑方式表現恨意的例子，說明柳宗元、劉禹錫（772~842）二人身處妬媚之間，所以能體會細微，發而為語才能有味如此。對於柳、劉二人的心理狀態抉析精微，因此「嘻笑之怒」、「長歌之音」極可能也是柳宗元為了自我保護所採取的策略之一，他所書寫的「險語」絕不是為文造情下刻意創造的，而是真實情形的記錄，可見仍是以意領語。

劉禹錫「駭機一發，浮謗如川」出自他致書李吉甫，自述因「昧於周身，措足危地」，以致遭遇「駭機一發，浮謗如川；巧言奇中，別白無路」處境，²⁸「駭機一發」、「浮謗如川」可能都是劉禹錫運用典故後自行重組新創的語詞，²⁹除了能恰如其份地刻劃外在環境的險惡可怕，「浮謗」更是明示謗言由來無根，卻如河川般漂散各地，源源不絕，具象描述謗言之流竄傷人，用語生動靈活，別具特色。常人絕少會想到以「浮如川」的方式形容謗言，劉禹錫此處比擬較為奇險，但就書贈對象與文意看來，劉禹錫應是確實感受到謗言的流播樣

²⁵同上註。

²⁶【宋】黃震：《黃氏日抄》（臺北市：大化書局，1984），卷60，682。

²⁷【明】馮時可：《雨航雜錄》卷上，《叢書集成新編》（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88，427-428。

²⁸【唐】劉禹錫，陶敏、陶紅雨校注：《上淮南李相公啟》，《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長沙市：岳麓書社，2003），卷14，928。

²⁹《後漢書》載：「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參見【南朝宋】范曄：《皇甫嵩朱雋列傳》，《後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卷71，2302。張華《女史箴》云：「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崇猶塵積，替若駭機」。參見【晉】張華：《女史箴》，嚴可均輯，《全晉文》（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99），606。《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參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校點。《國語·周語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

態如川行一般，才會創發上引文句，「意」、「語」仍是分不開的。

相較於柳、劉二人各引一例的「險語」，宋祁連續載錄三段韓愈「新語」的例子，似乎顯示韓愈語言新創表現較前二人豐富。為明三人異同，我們不妨一一檢視韓愈三例的情形，「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出自〈柳州羅池廟碑〉，³⁰追敘柳宗元擔任柳州刺史時教化百姓的仁政，首段的「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語序、邏輯異於常規，讓人誦讀之際不得不放慢速度，沉吟其間，接著帶出柳宗元教化成果：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³¹

大段以四字句陳述當地情景，使語氣較為平穩舒緩，增添典重氣韻，雖然大抵二句為一組，且逐漸對仗工切，但「子嚴父詔」前刻意為三句一組，易除之前「宅有新屋，步有新船」對仗修辭，改為較錯落文句，直到「子嚴父詔，婦順夫指」不但上下對仗，且每句一、三取人倫名詞文字相對，為了強調人民歸順情形，韓愈可能化用《莊子》、商湯嫁妹典故而將尋常父子夫婦語序對調，³²凡此種種都造成文句的陌生新鮮，殊異化結果自然呈現韓愈獨創的「新語」。

韓愈這段文字的書寫樣貌必定是經過審慎思考設計的，以「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為參照組，我們可以看到〈柳子厚墓誌銘〉中有類似文詞與意涵，那段文字寫法是：

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³³

文字長短不一，變化多致，純以氣貫串其中，是相當暢達的散文句式，相較之下，〈柳

³⁰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卷7，2440-2475。

³¹ 同上註，2440。

³² 《莊子·盜跖》云：「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參見【清】郭慶藩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3），991。商湯〈嫁妹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參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北京市：中華書局，1991），卷1，14。

³³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7，2596。

州羅池廟碑〉便是有意濃縮為四字句，以整鍊形式加強典重氣息，在這樣的創作心態下，新語的產生絕非意外。發現韓愈「子嚴父詔，婦順夫指」的新異外，宋祁也在精讀文本中擷取韓愈其他文詞優點，如〈回鶻傳〉記載：「頡利可汗之滅，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榭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³⁴「遠京師」便被宋祁援用。

第二例「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見於〈答崔立之書〉，韓愈三試吏部被黜後，崔斯立贈書勸勉，韓愈則回信抒發內心悲憤，陳明抱負，全篇一氣直下，略無滯礙，末尾表述個人選擇時，提到：

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³⁵

先以長句營造奔放縱橫氣勢，三句須得連貫而讀，顯示作者心中時刻不能或忘的掛念，繼而明白說出「僕雖不賢」，文意上正可與前三句心情接續呼應，以下表白則摻雜對仗句兩兩呈現，無論「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意思都是相關的，二句接連而出頗有重複強調作用，可見是韓愈著意書寫結果。全段用典不多，「取一障而乘之」可能是正用《史記》狄山乘障事，³⁶而「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應是化用許由、呂尚典故。在韓愈之前，並沒有「耕於寬閑之野」或「釣於寂寞之濱」的說法，韓愈為許由耕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³⁷加上「寬閑」二字，以顯示他不受王位，隱退心情，因是據義履

³⁴【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17（下），6135。

³⁵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3，704。

³⁶參見【漢】司馬遷：〈酷吏列傳·張湯〉，《史記》（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卷122，3141，文云：「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

³⁷【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上，〈許由〉載：「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日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

方，自我決定的生活，當然不會失落惆悵，反是寬閒自在。而呂尚在渭水之濱得識周文王之前，確是懷才不遇、窮困苦悶的，³⁸韓愈為此事加上「寂寞」二字頗能貼切描繪當時呂尚形單影隻的身影與心情。無論韓愈是藉「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解嘲語」³⁹「寫出胸中一段憤鬱」，⁴⁰或只是以鋪排筆法強調個人抉擇，二句確實生鮮特異，頗能引發讀者誦詠之際新奇感受，從而特別關注作者用心。

或許也因韓愈創造的詞語新異適切，之後屢有文人加以援用或點化入詩文，⁴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庭堅（1045～1105）〈宋喬年真贊〉云：

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為師，用其多以見己。相遭於功名之會，圖像麒麟。獨行於寂寞之濱，照影溪壑。大者四時爾，小者風雨爾，豈真我哉。⁴²

宋喬年（1047～1113）為宋庠孫兒，以父蔭任官，卻因事落魄20年，官場幾度沉浮，⁴³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輕天下色。」可見許由近於道家思想，不慕榮利，不越樽代庖，且有所堅持，凡事據義履方，行遵正道的形貌。參見【晉】皇甫謐：《高士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史部傳記類，冊448，88。

³⁸《史記》載：「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參見【漢】司馬遷：〈齊太公世家〉，《史記》，卷32，1197。《說苑》亦曰：「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參見【漢】劉向：《說苑》，嚴可均校讎，陳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點主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卷39，343，並可參看。

³⁹〈答崔立之書〉評語，【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臺北市：廣文出版社，1964），17。

⁴⁰錢基博。《韓集籀討集》，《韓愈志》（北京市：中國書店，1988），卷6，120。

⁴¹如：王安石詩句「逝將收桑榆，邀子寂寞濱。」參見【宋】李壁注，李之亮校點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市：巴蜀書社，2002），卷8，159；〈送徐天常入京序〉參見【元】陳高，鄭立于點校：《不繫舟漁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11，129；〈送柴紫材序〉參見【元】郝經：《陵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1192，329；〈答彭元發書〉參見【宋】李復：《澗水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21，33。

⁴²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冊2，《正集》，卷22，565。

⁴³《宋史》載：「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參見【元】脫脫等：〈宋喬年傳〉，《宋史》（北京市：中華書局，1977），卷356，11207-11208。

堪稱命運坎坷，其人雖不能詩，⁴⁴但似擅書畫、⁴⁵有創意，⁴⁶黃庭堅將宋喬年叔祖宋祁稱譽韓愈的「釣於寂寞之濱」加以轉化點用，再現宋喬年踽踽獨行，照影溪壑的清朗形跡，孤寂內心與仕途不遂情形貫串呂尚、韓愈而下，饒具深意。

此外，黃庭堅與摯友王紘（?~?）、晏幾道（1038~1110）⁴⁷相聚時，有感於三人臭味相似，⁴⁸皆是「癡絕處，不減顧長康」，⁴⁹或因此而「仕宦連蹇」，⁵⁰不禁慨言「二公老諳事，似解寂寞釣」，⁵¹「寂寞釣」恐有將自身與呂尚、韓愈相比擬意涵，推想黃庭堅可能十分賞愛「釣於寂寞之濱」。筆記小說曾記載黃庭堅熟讀宋祁《新唐書》而文章日進的故事，⁵²「寂寞釣」或許正可做為黃庭堅自宋祁處領受文章技法的參證之一，而這也證明了宋祁眼光獨到及他對韓愈接受史的貢獻。

第三例「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見於〈送殷員外序〉，⁵³描寫殷侗（767~838）受命出使回鶻前，「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甚至「持被入直三省，

⁴⁴《容齋隨筆·四筆》載：「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遑、鄴，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領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遑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參見【宋】洪邁：《容齋隨筆》，卷2·「大觀元夕詩」則，636。

⁴⁵參見《鐵圍山叢談》所載：「太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於是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所，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參見【宋】蔡條：《鐵圍山叢談》（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卷4，78。

⁴⁶《東京夢華錄》載：「大觀元年，宋喬年尹開封，迺於綵山中間高揭大榜，金字書曰：『大觀與民，同樂萬壽』綵山自是為故事。隨年號而揭之，蓋自宋尹始。」參見【宋】孟元老，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卷6·「元宵」則，579，似可見出宋喬年不拘舊規，應時開創新意。

⁴⁷關於晏幾道生卒年，自來有各種不同說法，夏承燾訂為1030~1106年，今人多從其說。參見涂木水。〈關於晏幾道的生卒年和排行〉，《文學遺產》，1期（1997）：107-108。則據晏殊二十九世孫主修之《東南晏氏重修宗譜》，確立其生年為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卒年為徽宗大觀4年（1110），說法可取。

⁴⁸黃庭堅詩云：「對酒誠獨難，論詩良不易。人生如草木，臭味要相似」，見〈自咸平至太康鞍馬間得十小詩寄懷晏叔原并問王稚川行李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此他日醉時與叔原所詠因以為韻〉，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外集》，卷11，1123。

⁴⁹黃庭堅〈次韻答叔原會寂照房呈稚川〉，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外集》，卷2，889。

⁵⁰黃庭堅〈小山集序〉評述晏幾道：「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而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饑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參見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5，413，但以二人情誼及黃庭堅自身際遇觀察，或也有幾分夫子自道意味。

⁵¹〈次韻叔原會寂照房〉，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外集》，卷2，891。全詩云：「風雨思齊詩，草木怨楚調。本無心擊排，勝日用歌嘯。僧窗茶煙底，清絕對二妙。俱含萬里情，雪梅開嶺徼。我慚風味淺，砌莎慕松蒿。中朝盛人物，誰與開顏笑。二公老諳事，似解寂寞釣。對之空歎嗟，樓閣重晚照」。

⁵²《曲洧舊聞》載：「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跡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視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但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參見【宋】朱弁，孔凡禮點校：《曲洧舊聞》（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卷4，142。

⁵³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4，1360。

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⁵⁴「刺刺」或作「刺刺」，⁵⁵二者意義、聲韻不同，「刺刺」多指風聲、拍擊、破裂聲，如「去程風刺刺，別夜漏丁丁」，⁵⁶如果用來形容殷侗叮嚀婢子言語，較為戾躁洪亮，似乎與當時情境不合。「刺刺」曾見於《管子》、《晉書》，⁵⁷但原意似乎與此處有所差別，潘岳抨擊和嶠時所說「和嶠刺促不得休」，⁵⁸文謙以「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為由，認為：「公語疑出此」。⁵⁹「刺刺不得休」與「刺促不得休」文字雖類近，但潘岳所謂「刺促」較具勞苦不休、忙碌急迫意涵，似與韓文不同，而時代接近的權德輿（759~818）嘗有「〈九歌〉傷澤畔，怨思徒刺促」⁶⁰語，王建（約767~830）也有「促促復刺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嫁不將歸，白頭猶著父母衣」，⁶¹或許都是啟發韓愈化用新創來源。

王士禛（1634~1711）曾贊揚宋祁用功甚深，詩歌「殆無一字無來歷」，⁶²或許也正是基於這樣的創作心態，所以宋祁觀看韓愈時，自然對於他「無一字無來處」卻又能「點鐵成金」⁶³的表現特別關注，也別具慧眼能加以抉發，肯定韓文「借事形容，曲盡文字之妙」⁶⁴

⁵⁴關於「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現存韓集各版本文字、斷句不同，或作「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或作「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文謙與方崧卿《韓集舉正》、魏仲舉編《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皆曾提及宋祁「持」字作「襪」字事。參見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4，1361，據文謙考辨，「當以襪為正」，並引蘇軾〈次韻林子中春日詩〉「東都寄食似浮雲，（巾業）被真成一宿賓」，說明「（巾業）」與「襪」同。

⁵⁵今可查見之各版本韓愈文集多作「刺刺」，僅有【宋】文謙：《新刊經進詳補注昌黎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南宋蜀刻本，2002），冊1310，644，與【唐】李漢編，【宋】祝充音註：《音註韓文公文集》（美國康乃爾大學圖書館藏文祿堂影印蕭山朱氏藏宋紹熙刻本）作「刺刺」。

⁵⁶李商隱〈送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參見朱懷春、曹光甫、高克勤標點。《李商隱全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9。

⁵⁷相關文本為：「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惛惛者不以天下為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孰能棄刺刺而為惛惛乎？」參見《管子·白心》，見顏昌峯。《管子校釋》（長沙市：岳麓書社，1996），342-343、「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參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4），卷40，1180。

⁵⁸〈潘岳傳〉文云：「岳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參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卷55，1502。

⁵⁹轉引自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4，1362-1363。

⁶⁰孫通海、王海燕（責編），〈數名詩〉，《全唐詩》，卷327，3666。

⁶¹孫通海、王海燕（責編），〈促促詞〉，《全唐詩》，卷297。

⁶²【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卷1。「宋祁詩」，19。

⁶³黃庭堅曾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參見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答洪駒父書三首〉，《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475。

⁶⁴【宋】黃震：《黃氏日抄》，卷59，674。

的成就。而這般觀看、接受角度勢得遍讀經籍，根柢深厚才有敏銳洞察力覺見韓愈文字來處及轉變之新異軌轍，實是一般讀者難以採取的閱讀進路，也是宋祁獨特接受方式，他人難以企及。

前文曾論及「釣於寂寞之濱」、《新唐書》與黃庭堅的關聯，而所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之說廣為後人認同引用，是否也是黃庭堅受宋祁影響而獲致的觀看韓愈角度，雖因史料不足無法斷言，但宋祁評論開宋人風氣之先，應有不容忽視的關鍵作用。

綜合宋祁所舉三例，都可能是韓愈從古籍得來靈感，化用相關典故而創造嶄新語詞，又能貼切巧適地傳達作者所想表述的意涵、情景，與全篇渾融合一，柳宗元、劉禹錫詞語則因異於常規而讓讀者一眼就能窺見新變處，所以是「險語」而非「新語」。宋祁自己「好造語」，⁶⁵且宋人重視「意新語工」，但也常希望能達致「無法之法」般自然無跡，韓愈「新語」便頗能符合此種期待。

關於韓、柳、劉三人，宋祁另有文字論道：

柳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朽，不巧於古，而語一出諸己。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目品焉。⁶⁶

明確贊揚韓愈「卓然不朽」，遠高出柳、劉二人之上，原因正是在於寫作時不巧於古，語詞一出諸己。此外，「新意」也是宋祁品評標準之一，所謂：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⁶⁷

舉出韓愈〈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四篇文章，肯定皆為古人意思未到的名家之作。唐代雖有「送窮」習俗，⁶⁸但韓愈之前並未有人慎重其事特地撰寫文章資送窮鬼，尤以對答方式呈現主人、五鬼談話內容及五鬼失笑相顧情狀，生動怪奇，甚至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效果，看似詼諧詭故，但又寓含「人生一世，其久幾何」的思悟，耐人玩味。黃庭堅雖說〈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⁶⁹，但也承

⁶⁵【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50。

⁶⁶【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卷上，48。

⁶⁷同上註，卷中，55-56。

⁶⁸《荊楚歲時記》載：「正月晦日，送窮鬼。」參見【南朝梁】宋懔，王毓榮注：《荊楚歲時記校注》（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8），93。

⁶⁹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跋韓退之送窮文〉，《黃庭堅全集·別集》，卷7，1594。

認「〈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⁷⁰且無論寫作技巧、文氣、內容深度，〈送窮文〉都遠出〈逐貧賦〉之上，⁷¹二篇仍是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送窮文〉在宋代或後世固然引發正反各種討論，但宋祁可能是第一位將該文從韓愈作品中特別標舉出來，發掘作者用心的異代知音。

〈進學解〉、〈毛穎傳〉，前人曾指出是因襲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袁淑〈雞九錫文〉、〈驢山公九錫文〉、〈修竹彈甘蕉文〉而寫，雖是前有所承的戲倣之作，但韓愈以雄豪文筆書寫，賦予新意，仍有獨特風格。以〈進學解〉為例，該篇或是韓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⁷²作以自喻之文，正如林雲銘（1628~1697）所言：

其格調雖本〈客難〉、〈解嘲〉、〈答賓戲〉諸篇，但諸篇都是自疏己長，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許多抑鬱，盡數借他人口中說出，而自家卻以平心和氣處之。看來無嘆老嗟卑之跡，其實嘆老嗟卑之心，無有甚於此者，乃〈送窮〉之變體也。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尤不易及。⁷³

無論書寫筆法、寓意、重點都與前人有別，尤其文章表面並未流露絲毫嘆老嗟卑蹤跡，卻深藏嘆老嗟卑之心，層次豐富，欲言還休，更耐人尋繹。錢基博（1887~1957）評道：

或謂：「〈進學解〉仿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氣味之淵懿不及。」祇是皮相之談。其實東方朔〈客難〉以「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柱意；揚雄〈解嘲〉則結穴於「亦會其時之可為也」一語，皆以時勢不同立論；而〈進學解〉則靠定自身發揮，此命意之不同也。〈客難〉瑰邁宏放，猶是《國策》縱橫之餘；〈解嘲〉鏗鏘鼓舞，則為漢京詞賦之體；而〈進學解〉跌宕昭彰，乃開宋文爽朗之意，此文格之不同也。所同者，則以主客之體，自譬自解以抒憤鬱耳。⁷⁴

剖析〈進學解〉與〈客難〉、〈解嘲〉命意、文格、筆法異同之處，確能具體闡明韓文「超前而斷後」⁷⁵成就，印證宋祁「古人意思未到」論述。

⁷⁰ 同上註。

⁷¹ 林紓便認為：「〈逐貧賦〉，揚子與貧，但一問一答。〈送窮文〉則再問再答。文氣似厚，而所以描寫窮之真相，亦較揚文為深刻，真神技也。」參見【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53。

⁷² 【後晉】劉昫等：《韓愈傳》，《舊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卷160，4196。

⁷³ 【清】林雲銘：〈進學解〉評語，《古文析義合編》（臺北市：廣文書局，1965），上冊，卷5，247。

⁷⁴ 《韓愈志·韓集籀讀錄》。參見羅聯添，《韓愈研究》，287。

⁷⁵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昌黎先生全集錄》，卷1，〈進學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市：莊嚴文化，1977），冊404，274。

而〈毛穎傳〉文成後，時人便多「大笑以為怪」，⁷⁶柳宗元認為韓愈是「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⁷⁷加以崇揚，頗有對抗流俗，發明韓愈用心之意。全篇雖似史傳筆法，其實仍深具戲謔意味，激勵學者、有益於世是否為韓愈本意，或仍有商榷空間。

《舊唐書》批判〈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⁷⁸並未能完全掌握作者用意。《新唐書》雖未提及這篇文章，宋祁卻於筆記中肯定〈毛穎傳〉為：「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撇開道德判斷、政治作用而從文學層面討論，應較前引諸人貼近韓愈創作心態。

《宋景文公筆記》中論及韓愈的記載共五則，前四則都側重在創新、自名一家的角度，另一則資料則提到：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揚雄曰「大醇而小疵」。予以為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⁷⁹

並未討論文章作法或成就，而是對於韓愈評論孟軻、荀況、揚雄「醇」、「疵」問題發表異議，⁸⁰宋祁關注焦點顯然在於「用」字，但並不因此否定「立言」價值。

綜結而言，宋祁在私領域對韓愈的觀看基本上是以「陳言務去」為重點，發現韓愈文章意、語新創處，這自是和當時文壇氛圍有關，考諸宋祁自身創作，他也十分重視創新，俞德鄰追記道：

宋景文公常言為文之要：「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善夫！⁸¹

其中理念與宋祁文學觀念頗為吻合，宋人詩話也留有宋祁賦詩字斟句酌的紀錄，而無論詩歌、辭賦，宋祁作品都自具新貌，⁸²或許正是基於這種因素，宋祁才會採取特定角度閱讀韓愈，從而一再彰顯韓愈自名一家的面向。

⁷⁶【唐】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柳宗元集》，569。

⁷⁷同上註，570-571。

⁷⁸【後晉】劉昫等：〈韓愈傳〉，《舊唐書》，卷160，4204。

⁷⁹【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卷中，57。

⁸⁰韓愈相關文字見於羅聯添（編），〈讀荀〉，《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1，202。

⁸¹【宋】俞德鄰：《佩韋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冊1189，卷19，152。

⁸²參見謝佩芬。〈將飛更作回風舞——宋祁詩歌特色與宋詩發展之研究〉，載於《從風騷到戲曲——第一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世新大學，2009），187-213。

參、探求古文淵源

宋祁對韓愈的接受還可以從另一個層面考察，也就是他對梁肅（753～793）與韓愈關係的認知，為了明瞭相關語脈，我們不妨先看看《舊唐書·韓愈傳》是怎麼提到這件事的：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⁸³

文章開篇先簡單交代韓愈姓字、里籍基本資料後，只以「無名位」三字介紹韓愈父親，不及其他先祖，反倒是對於「三歲而孤」之後的成長歷程與因此影響有所強調。晚近心理學家多半同意，父親是男孩在家庭裡主要模倣效習的對象，但韓愈自小便缺乏父愛，伯兄韓愈又長年在外任官，艱苦的環境下，韓愈似乎只能將目光投注到書籍典冊中留存的巨大身影，尋覓可以引領他前進的燈塔。身為孤子，韓愈更得刻苦學習，才能企望有朝一日光耀門楣，而他所尋訪追慕的目標是以儒家為依歸，這樣的努力完全發自於內心自我鞭策的動力，毋須外在名利勸誘。

劉煦（887～946）認為，大曆、貞元年間，學者崇尚古學，因而興起效法揚雄（前53～18）、董仲舒（前179～前104）述作的風潮，其中又以獨孤及（725～777）、梁肅最為淵雅深奧，普受儒林推重，韓愈極可能因此從其徒游，並著意鑽仰，以期能於當代有所作為。據此，韓愈古文淵源乃傳承自獨孤及、梁肅，而梁肅師事獨孤及，⁸⁴三人之間一脈相承的脈絡看來十分明確清楚。

宋祁編寫《新唐書》〈韓愈傳〉時並未全然認同《舊唐書》的陳述，改易不少文字，如：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

⁸³【後晉】劉煦等：〈韓愈傳〉，《舊唐書》，卷160，4195。

⁸⁴梁肅嘗編集獨孤及《常州集》，並撰寫後序。參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獨孤常州集二十卷」條，（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9），252；梁肅於序中自稱門下生，「頗述師承之意」參見「梁補闕集二十卷」條，【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16，而【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獨孤及傳》，4992云：「（獨孤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

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⁸⁵

將昌黎郡望寫法改成「鄧州南陽人」，較為精確，再將先人中較具名望、貢獻的七世祖略加介紹，書明「有功」受封，《舊唐書》說「無名位」的韓父在《新唐書》裡為官有美政，深受縣人愛戴，以至卸職後縣人刻石頌德。對於韓愈家世明顯著墨較多，有學者認為這是為了抬高韓愈出身，使他從貧寒之家變成王侯之後，⁸⁶如果對照韓愈〈柳子厚墓誌銘〉首段記敘柳宗元先世筆法：

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⁸⁷

不難發現，略有異曲同工之妙，二文都是自傳主七世祖寫起，都只毛舉幾位值得記述的先人，先人彼此行事作為都有相同點，柳宗元父祖以「剛直」為著，韓愈祖先則是對黎民蒼生、家國有功，絕非尸位素餐官員。雖然《新唐書》提到「封安定王」、「終祕書郎」，但宋祁目的恐不在於抬高韓愈出身，而是為了與下文「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對比，襯顯出韓愈家道中落，生活艱辛的景況，也為後文「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⁸⁸「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⁸⁹禁袁人為隸等種種事蹟做一伏筆。

家世敘述完畢後，宋祁接著以「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涵括韓愈求學歷程與趨向，在「三歲而孤」與「會卒」、「嫂鄭鞠之」後，所謂「自知讀書」更凸顯韓愈的孤立無援、奮發圖強。《新唐書》裡的韓愈不再一以儒家為宗尚，而是通六經、百家學，學問廣博，似如宋祁「學該九流」、⁹⁰「博學能文章」⁹¹般，而宋祁曾感傷回憶自己：「稟生暗愚，少小多病，十有三歲，慈母見損」、⁹²「少為學，本

⁸⁵【宋】歐陽修、宋祁：〈韓愈傳〉，《新唐書》，卷176，5265。

⁸⁶參見盧榮。《韓柳文學綜論》（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6），205；田恩銘。《兩《唐書》中的中唐文學家傳記研究》（博士論文，陝西師範大學，2008），149。

⁸⁷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冊3，卷7，2579。

⁸⁸【宋】歐陽修、宋祁：〈韓愈傳〉，《新唐書》，卷176，5255。

⁸⁹同上註。

⁹⁰【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27，402。

⁹¹【宋】魏泰：《東軒筆錄》，卷15，115。

⁹²曾棗莊、劉琳（主編），〈祈福醮文〉，《全宋文》，卷530，185。

無師友，家苦貧無書」，⁹³當他書寫韓愈的這段歷史時，不知是否曾在恍惚迷離之中照見自己的身影？

除了二人際遇的部分相似處外，《新唐書》裡最須重視的其實是關於韓愈古文淵源的一段紀錄全數被刪除，關於這部分的改動，學界似乎較為忽略，田恩銘仔細比較後，認為宋祁目的有二：

一是對獨孤及、梁肅的評價不高，尤其是他們的思想來源不夠純粹。二是宋祁欲樹立韓愈卓然獨立的大家風範，故而隱去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⁹⁴

「思想來源不夠純粹」指的大概是梁肅撰有《天台止觀統例》、《刪定止觀》二部佛學專著及24篇佛學文章，他是位佛教色彩濃厚的文人，甚至可能是佛學造就古文家梁肅，⁹⁵但梁肅學問根柢卻是「貫極乎六籍，旁羅乎百氏，考太史公之實錄，又考老莊道家之言，皆覩其奧而觀其妙，立德玩詞以為文。其所論載諷詠，法於《春秋》，協於〈謨〉、〈訓〉，〈大雅〉之疏達而信，〈頌〉之寬靜形焉。」⁹⁶看來與韓愈未必有所衝突，學者聚焦於韓愈〈諫迎佛骨表〉中所表露的排佛形象，因此認定宋祁必會因為獨孤及、梁肅信佛而隱諱不談三人關係，恐怕仍有考辨空間。

至於宋祁對獨孤及、梁肅評價，《新唐書》說到：「（獨孤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⁹⁷又在〈文藝傳〉中專立一段書寫梁肅事蹟，⁹⁸記載：「（蘇）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⁹⁹「（呂溫）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為文章」，¹⁰⁰「評價不高」情形似乎並不存在。

宋祁刪除梁肅相關文字，極可能是他並不相信韓愈曾經師從獨孤及、梁肅，文謙曾云：

舊史：公傳云大曆正元間，獨孤及梁肅為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然及之死在大曆

⁹³【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卷上，47。

⁹⁴田恩銘，《兩《唐書》中的中唐文學家傳記研究》，150。

⁹⁵姜光斗。〈論梁肅的佛學造詣及其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貢獻〉，《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9卷2期（1993）：18。

⁹⁶【唐】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參見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6107。

⁹⁷【宋】歐陽修、宋祁：〈獨孤及傳〉，《新唐書》，卷162，4993。

⁹⁸【宋】歐陽修、宋祁：〈文藝傳〉，《新唐書》，卷202，5774。

⁹⁹同上註，5773。

¹⁰⁰【宋】歐陽修、宋祁：〈呂溫傳〉，《新唐書》，卷160，4967。

十二年，公時始十歲，尚及與之周旋耶？蓋謂從其徒梁肅游也。¹⁰¹

以獨孤及、韓愈年紀及活動年代推測韓愈不曾與獨孤及交游，《舊唐書》所記應僅限於梁肅，但韓愈詩文作品中提及梁肅的僅有〈與祠部陸員外書〉：

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¹⁰²

文章主旨在討論主司信人取材事，並舉自身貞元8年（792）科考情形為例，說明陸贄（754~805）司貢士時信人不疑，梁肅、王礎（?~799）輔佐舉薦人材得當之美談，慨歎良風不再，希望陸儔（?~?）能效法前賢，繼續為國舉才。除此段資料外，韓愈並未曾言及他追隨梁肅學習古文一事，反而是《唐摭言》中的一段軼事廣為流傳，令人印象深刻：

（唐）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群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¹⁰³

文中記載韓愈、李觀（766~794）四人曾游於梁肅之門，有學者認為其事在貞元6年（790），¹⁰⁴王定保（870~941）錄載此則資料，重點可能在於凸顯梁肅人倫識鑒能力，而以韓愈諸人遊於門下事做為輔證，李觀曾自云：「觀嘗以未名前，高見揄揚」，¹⁰⁵學者認

¹⁰¹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注語，參見【宋】文謙：《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1310，66。

¹⁰²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3，902。

¹⁰³ 【五代】王定保，姜漢椿校注：《唐摭言》（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卷7，151。

¹⁰⁴ 如胡大浚、張春雯。〈梁肅年譜稿（下）〉，《甘肅社會科學》，1期（1997）：45-48，便將此事繫於貞元6年；蔣寅。〈梁肅年譜〉，載於《大歷詩人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526-552；神田喜一郎。〈梁肅年譜〉，載於《東方學論集：東方學會創立25周年》（東京都：東方學會，1972），259-274則未載記此事。

¹⁰⁵ 李觀，〈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參見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卷534，6200。

為唐人及第艱難不易，所以會對座主獎拔感恩戴德，¹⁰⁶梁肅與韓愈諸人雖非座主、門生關係，但依《唐摭言》所記，韓愈、李絳（764~830）、崔群（772~832）應當也會對梁肅滿懷感激之情，但他們三人現存文章中並無隻字片語提及此事，似乎有些奇怪。五代孫光憲（900~968）《北夢瑣言》也曾有相關記載：

孫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荀、孟，糠粃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¹⁰⁷

文中「梁浩」，據查唐代並無此人，可能是「梁肅」之誤。如比對《舊唐書》、《唐摭言》、《北夢瑣言》資料，可知五代時，已有韓愈諸人宗仰梁肅的觀念，但各書內容其實仍有不同，如《北夢瑣言》條舉宗仰梁肅文人時，便加入了柳宗元、李翱（772~841）、皇甫湜（777~835），究竟何者說法較為可靠，或因彼此傳鈔而有異同，仍有待詳考。

現代學者幾乎都肯定《唐摭言》對於保存、研究唐代科舉制度卓具貢獻，¹⁰⁸但他們卻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唐摭言》內容是否都是真實可信的？王定保自述：「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¹⁰⁹因為未曾到過京師，《唐摭言》所錄存的內容便有可能不全都是採自第一手資料，有些也許是輾轉聽聞的小道消息或鄰里傳言，如「李洞」其人其事，吳在慶便詳加考證，斷定「王定保因同情李洞，因此依據傳聞記下『裴（贛）公無子』事」，¹¹⁰提醒讀者須得對《唐摭言》之論述抱持較審慎態度。

又如王勃（650?~676?）〈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膾炙人口，《唐摭言》關於此事的記載更是為人熟知，¹¹¹無論王勃以14歲神童之姿賦此不朽鉅作，或「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技驚四座，都是後世文人傳誦不已的佳話。但宋祁編撰《新唐書·文藝

¹⁰⁶ 紀昌和。《《唐摭言》研究》（碩士論文，上海師範大學，2006），54。

¹⁰⁷ 「李磻行狀」條，參見【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全宋筆記》（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3，第一編），82。

¹⁰⁸ 近年兩岸都有關於《唐摭言》的學位論文，如：邱立玲。《《唐摭言》史料價值探微》（碩士論文，吉林大學，2005）；紀昌和。《《唐摭言》研究》；陶紹清。《《唐摭言》研究》（博士論文，復旦大學，2007）；黃淑恩。《《唐摭言》研究——科舉制度下的士人風貌與心境》（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2007），138。

¹⁰⁹ 【五代】王定保，姜漢椿校注：〈散序〉，《唐摭言》，卷3，46。

¹¹⁰ 吳在慶。〈《唐摭言》、《唐才子傳》所記李洞事蹟考〉，《周口師範學院學報》，19卷4期（2002）：25-30。

¹¹¹ 文云：「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墾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構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參見【五代】王定保，姜漢椿校注：〈以某人不稱才試而後驚〉，《唐摭言》，卷5，116。

傳》便不取王勃14歲作文及孟學士之說，《唐才子傳》及蔣之翹（1596～1659）、高步瀛（1873～1940）都懷疑14歲之說，考諸各種資料，《唐摭言》此則記載較近於小說趣聞，可信度不高。而宋祁刪落王勃作文年紀及閻公女婿事，可見他當時便已懷疑《唐摭言》的真實性。再如白居易拜謁顧況（727?～815?）事，¹¹²民間流傳甚廣，但也是穿鑿附會的傳聞而已，並非事實。

因此，雖然宋代《唐摭言》廣泛流傳，¹¹³但宋祁極可能已發現該書不能全信，經過一番考查探求，認定韓愈並未師從獨孤及、梁肅，因而刪除《舊唐書》關於韓愈古文淵源的一段文字，顯示宋祁對於韓愈相關史料的明辨慎思，他的處理也必然會影響後人研究韓愈的觀點。

肆、校改文章字詞

接受史的研究，除了梳理後人對於某一文人作品的選錄、討論、模倣之外，對於文集的編修刊刻也是觀察面向之一，尤其宋代印刷方便普及，宋人對文獻整理較前人熱衷，也投入更多資源，成果豐碩。而文人的閱讀與欣賞常互為因果，因為閱讀，所以欣賞，也因為欣賞，所以閱讀，更會在閱讀之中有所發現，發現錯謬缺漏，所以校訂；發現佳文美句，所以編印，因為校訂編印，使得更多人能夠參與閱讀，無形中也就擴大了「接受」的廣度與深度。

李漢之後，韓愈文集便有諸多刊印校注本，祝充、文謙、方崧卿、朱熹、魏仲舉都是宋代較著名的注者，但宋祁其實也曾校改韓集，如〈爭臣論〉中「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一句，《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作「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韓集舉正》則刪去「實一匹夫」四字，注云：「宋本亦疑此四字」，¹¹⁴可見方崧卿認同宋祁對此句文字的判讀。韓愈〈爭臣論〉雖然對諫議大夫陽城多所不滿，時加訾議，但根據下文「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句式、文意及全篇用詞看來，「實一匹夫」確似是衍文，宋祁的刪修可能較接近韓愈原文。

因資料散佚，今日已無法見到宋祁校訂韓集的全貌，不過，透過《新唐書》對韓愈作品

¹¹²文云：「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况嘆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參見【五代】王定保，姜漢椿校注：〈知己〉，《唐摭言》，卷7，152。

¹¹³紀昌和，《《唐摭言》研究》，92。

¹¹⁴參見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2，500，502-503。關於此段文字，各版本頗有差異，計有：「陽子在位」、「陽子實一匹夫，在位」、「陽子實一介之夫，陽子」、「陽子實一匹夫，陽子在此位」、「陽子實一介之夫」、「陽子實匹夫，陽子」幾種記載。

的採錄引用，或許也可觀察到宋祁對韓愈文章的接受態度。據統計，《新唐書》共採摭18篇韓文，¹¹⁵〈韓愈傳〉、〈順宗實錄〉、〈諫佛骨表〉都有學者詳加比較研究，其餘篇章則仍有可討論空間，如〈孔戣傳〉，《新唐書》敘及孔戣以老自乞致仕事，記道：

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為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即上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事。今戣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¹¹⁶

先以對話方式記錄韓愈對於孔戣（753~825）乞求致仕的擔憂不捨，「何去之果？」、「何恃而歸？」栩栩如生地傳遞出韓愈神態。因勸留失敗，所以韓愈上疏諫請君王切勿聽許該事，寫來流暢自然，如閱覽小說般生動有趣。《新唐書》在「即上疏言」中摘用韓愈〈論孔戣致仕狀〉內容，¹¹⁷「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簡省為「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因既在「南省」，必然是「任官」，所以刪去「為官」二字無損文意，又可使文字簡明；因是論孔戣之事，「數與戣相見」如刪去「戣」字，文意仍是明朗，但「數與相見」較不通順，所以改為「得」字。

「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才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一段，《新唐書》改動不多，但韓文「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交代上疏原由與贊揚君皇言詞，宋祁全數刪除；「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則省略為「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文字大幅減少，意思卻已保留；「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宋祁改為「今戣據禮求

¹¹⁵ 關於《新唐書》採摭韓文的數量，各家說法不一，田恩銘列表詳記所採韓文、《新唐書》出處及採摭狀況，信實有據，今依其說。參見田恩銘，《兩《唐書》中的中唐文學家傳記研究》，163-164。

¹¹⁶ 【宋】歐陽修、宋祁：〈孔戣傳〉，《新唐書》，卷163，5010。

¹¹⁷ 參見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冊4，卷8，3306-3312，為省篇幅，以下不一一加註說明。

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文氣雖不如原文跌宕富情感，但較簡鍊俐落，宋祁尤其喜歡刪除「而」、「於」之類字詞，文意不變，但情韻不同，基本上確是「文簡」。¹¹⁸

前文所引《新唐書》文字，《舊唐書》寫道：

穆宗即位，召為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戮在南海時家人受賂，上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轉尚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¹¹⁹

只以「累請老」三字帶過，並未詳述中間過程，兩相比較，《新唐書》較具文學筆觸，對韓愈文字的採摭改寫能使故事更豐富生動，體現人物風采，也反應宋祁對韓文的賞愛之情。

再如《新唐書》〈歸崇敬傳〉末尾，宋祁贊語寫道：

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¹²⁰

乃節錄改寫自韓愈〈處州孔子廟碑〉，相關原文為：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¹²¹

韓愈原文「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較有鋪排、循序漸進層次，前二句敘述事實，答案隱而不論，讓讀者有好奇期待心理，到第三句方才豁然知曉，而宋祁寫法則是濃縮為一句，直截明白，符合史書要求，少了些曼衍情韻。關於祭拜

¹¹⁸ 【清】丁子復。《唐書合鈔補正》，《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4。

¹¹⁹ 【後晉】劉昫等：〈孔戮傳〉，《舊唐書》，卷154，4098。

¹²⁰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164，5058。

¹²¹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卷7，2410-2411。

情事，韓愈臚舉數例以對比孔子情形，宋祁則是直接闡說「獨孔子用王者事」，甚至在「孔子以德」間加上「則」，以加強對照口氣，文意更完足。

引錄韓文後，宋祁以「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表抒感歎，可見此處贊文改寫並不只是著眼於韓愈文章內容，更欽仰的是韓愈的見識、賢德。相較於《舊唐書》「褒貶以言，孔道是模。誅亂以筆，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馬何辜？懲惡勸善，史不可無」¹²²贊語，《舊唐書》承襲傳統四言贊語寫法，押韻典重，《新唐書》則較重作者個人情感，感發力量較強。而引韓愈文字作為「贊」內容，並據此發抒感慨，也可感受宋祁與韓愈生命脈動的契合與欣賞。

伍、結語

研究韓愈與宋祁問題的論著，一般多以《新唐書·韓愈傳》為主，剖析新、舊《唐書》觀點、筆法，本文綜觀宋祁論及韓愈的相關資料，分類探討其中尚未辨明的問題，目前得致幾項結論：

一、宋祁深切感知宋人必須求新自立的時代處境，他在私領域觀看韓愈的焦點側重於「陳言務去」層面，所謂「陳言務去」其實涵括意、語二方面的新創，惟其如此，才可能自名一家。

二、宋祁常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三人並舉同論，柳、劉二人都有異於常規而讓人印象深刻的特殊語句，宋祁名為「險語」，韓愈則擅長自古籍中化用典故自創「新語」，頗能貼切巧適地傳達意涵，與全篇渾融合一。

三、〈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為宋祁特別稱許為「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的作家，其中〈送窮文〉在宋代或後世引發正反各種討論，宋祁極可能是第一位抉發作者用心的異代知音。

四、宋祁詩歌、辭賦都自具新貌，文學觀念也重視求新獨創，因此會採取特定角度閱讀韓愈，從而一再彰顯韓愈自名一家的面向。

五、《舊唐書》提及韓愈從獨孤及、梁肅之徒游，《新唐書》將相關文字全數刪除，未必與凸顯卓然自立有關，極可能是宋祁發現關於韓愈古文淵源的問題必須審慎探求，不能盡信五代說法，這也顯示宋祁對於韓愈相關史料的明辨慎思。

六、宋祁曾校改韓集，〈爭臣論〉「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宋祁判為「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自前後句式、文意及全篇用詞考察，宋祁的刪修可能較接近韓愈原文。

¹²²【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149，4038。

七、《新唐書》採摭多篇韓文入史，多為全文引錄，〈孔戣傳〉則是摘用〈論孔戣致仕狀〉內容加以刪修，文氣雖不如原文跌宕富情感，但較簡鍊俐落，宋祁尤喜刪除「而」、「於」之類字詞，文意不變，情韻卻不同，確屬「文簡」。

八、《新唐書》〈歸崇敬傳〉末尾，宋祁將韓愈〈處州孔子廟碑〉文字節錄改寫成贊語，少了鋪排曼衍情韻，趨向直截明白，並以「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表抒感歎，可見宋祁對韓愈的觀看不僅限於文章本身，更包含見識、人品的欽仰。

致謝

兩位匿名審查者惠賜寶貴意見，助成拙稿得以修訂粗疏不足之處，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漢】劉向：《說苑》，【清】嚴可均校讎，陳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點主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晉】皇甫謐：《高士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晉】張華：《女史箴》，【清】嚴可均輯，《全晉文》（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99）。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
- 【南朝梁】宗懷，王毓榮注：《荊楚歲時記校注》（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8）。
- 【唐】李漢編，【宋】祝充音註：《音註韓文公文集》（美國康乃爾大學圖書館藏文祿堂影印蕭山朱氏藏宋紹熙刻本）。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4）。
-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
- 【唐】劉禹錫，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長沙市：岳麓書社，2003）。
- 【五代】王定保，姜漢椿校注：《唐摭言》（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全宋筆記》（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3）。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
- 【宋】文謙：《新刊經進詳補注昌黎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南宋蜀刻本，2002）。
- 【宋】朱弁，孔凡禮點校：《曲洧舊聞》（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
-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全宋筆記》（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3）。
- 【宋】李復：《澠水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李壁注，李之亮校點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市：巴蜀書社，2002）。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79）。
- 【宋】孟元老，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
-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宋】俞德鄰：《佩韋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678）。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9）。
- 【宋】黃震：《黃氏日抄》（臺北市：大化書局，1984）。
-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全宋筆記》（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6）。
- 【宋】趙翼，王樹民校注：《廿二史劄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2003）。
- 【宋】歐陽修，李逸安點校：〈記舊本韓文後〉，《歐陽修全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1），卷73，1056-1057。
-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訓門人九〉，《朱子語類》（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卷121，2924。
- 【宋】魏泰：《東軒筆錄》，《全宋筆記》（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6）。
- 【元】郝經：《陵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市：中華書局，1977）。
- 【元】陳高，鄭立于點校：《不繫舟漁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明】馮時可：《雨航雜錄》，《叢書集成新編》（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清】丁子復：《唐書合鈔補正》，《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
- 【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臺北市：廣文書局，1964）。
- 【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臺北市：廣文書局，1965）。
- 【清】郭慶藩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3）。
- 【清】潘永因：《宋稗類鈔》，《筆記小說大觀》（臺北市：新興出版社，1984）。
-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市：莊嚴文化，1977）。
-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北京市：中華書局，1991）。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輯考》（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 田恩銘。《兩《唐書》中的中唐文學家傳記研究》（博士論文，陝西師範大學，2008）。
- 朱懷春、曹光甫、高克勤標點。《李商隱全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吳立仁。《中唐至北宋前期韓愈形象的歷史演變》（碩士論文，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09）。
- 吳在慶。〈《唐摭言》、《唐才子傳》所記李洞事蹟考〉，《周口師範學院學報》，19卷4期（2002）：25-30。
- 余歷雄。《兩《唐書》采摭韓愈古文之研究》（博士論文，南京大學，2004）。
- 谷曙光。《韓愈詩歌在北宋的接受歷程及其詩學意義發微》（碩士論文，安徽師範大學，2003）。
- 邢香菊。《《新唐書·文藝傳》研究》（碩士論文，河北師範大學，2007）。
-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邱立玲。《《唐摭言》史料價值探微》（碩士論文，吉林大學，2005）。
- 姜光斗。〈論梁肅的佛學造詣及其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貢獻〉，《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9卷2期（1993）：18。
- 姚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
- 紀昌和。《《唐摭言》研究》（碩士論文，上海師範大學，2006）。
- 神田喜一郎。〈梁肅年譜〉，載於《東方學論集：東方學會創立25周年》（東京都：東方學會，1972），259-274。
- 胡大浚、張春雯。〈梁肅年譜稿（下）〉，《甘肅社會科學》，1期（1997）：45-48。
- 唐鳳霞。《《新唐書》的編纂及其學術成就》（碩士論文，安徽大學，2006）。
- 孫通海、王海燕（責編）。《全唐詩》（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
-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
- 郝至祥。《兩《唐書》書法暨筆法比較研究——兼論《新唐書》關佛刪史》（碩士論文，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 高光敏。《北宋時期對韓愈接受之研究》（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2004）。
- 涂木水。〈關於晏幾道的生卒年和排行〉，《文學遺產》，1期（1997）：107-108。
- 張瑞麟。《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博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2010）。
- 張蜀蕙。《書寫與文類——以韓愈詮釋為中心探究北宋書寫觀》（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2000）。
- 梁承根。《兩《唐書》文人傳之比較》（博士論文，南京大學，1997）。
- 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臺北市：華正書局，1981）。
- 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

- 陳昭吟。《宋代詩人之「影響的焦慮」研究》（博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2007）。
- 陶紹清。《《唐摭言》研究》（博士論文，復旦大學，2007）。
- 曾金承。《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博士論文，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2008）。
-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黃淑恩。《《唐摭言》研究——科舉制度下的士人風貌與心境》（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2007）。
- 楊家駱。〈新唐書述要〉，載於《二十五史識語》（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344。
- 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 蔣寅。〈梁肅年譜〉，載於《大歷詩人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526-552。
- 盧榮。《韓柳文學綜論》（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6）。
- 錢忠平。《《新唐書》文學批評研究》（碩士論文，浙江師範大學，2007）。
- 錢基博。《韓集籀討集》，載於《韓愈志》（北京市：中國書店，1998），卷6，120。
- 謝佩芬。〈將飛更作回風舞——宋祁詩歌特色與宋詩發展之研究〉，載於《從風騷到戲曲——第一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世新大學，2009），187-213。
- 顏昌嶠。《管子校釋》（長沙市：岳麓書社，1996）。
- 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7）。
-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
- 譚瓊。《兩《唐書》文學批評比較研究》（碩士論文，汕頭大學，2008）。

Song Qi's Reception of Han Yu: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Source Tracing, and Literary Revision

Pei-Fen Hsieh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Han Yu holds a high status in literary history, receiving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ong Dynasty historians, and arousing many relevant discourses. Involved academia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from studying Han Yu. However, Song Qi's reception of Han Yu mostly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an Yu's Biography" in the *New Book of Tang*, still leaving room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source tracing, and literary revision, and concretely analyzes the meanings and reasons behind Song Qi's comments on Han Yu, such as "new expressions", "eminent and immortal", "the ancients did not get the idea", and "create one'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erns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regarding Han Yu in the *New Book of Tang* and *Old Book of Tang* to determine the intention of Song Qi's deletion of Liang Su's information. Ultimately, considering Song Qi's proofreading and correction of Han Yu's works as exemplary cas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vising circumstances, merits, and demerits to grasp Song Qi's receptive viewpoints and attitudes towards Han Yu.

Keywords: Classical prose, Song Qi, reception history, *New Book of Tang*, Han Yu

